



当代学术文丛



从建构到失语

——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
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

р

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倪稼民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从建构到失语

——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倪稼民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建构到失语: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倪稼民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210 - 03613 - 5

I. 从… II. 倪… III. 革命知识分子—研究—俄罗斯 IV. D7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8019 号

从建构到失语

——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

作 者:倪稼民

责任编辑:邓丽红

封面设计:蔡二弘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 - 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3613 - 5/D · 607

定价:21.0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周尚文

忧国忧民忧天下,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尤为明显,他们承载着社会变革中急先锋的角色。从19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等满怀民主主义激情的思想家,从狂热不羁的民粹派到意志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多数人无不是知识分子。在俄国的传统里,尽管也有依附于沙皇统治的御用文人,但就其多数和主流而言,充满理想主义、人文关怀、不懈奋斗、牺牲精神才是俄国知识分子更为显著的性格特征。

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政治上黑暗,经济上孱弱,广大劳苦大众备受贫困、饥饿的煎熬。高举反对沙皇统治的旗帜,为民请命,为民代言,就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然而,知识分子的抗争得到的是统治者无比严厉的惩罚:牢狱、流放、绞刑架。于是,一批满怀激情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道路,19世纪末期的民意党人就其个人品质而言,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和行动后果来说,是无法改变现存制度的,尽管这种社会制度已处在衰败的境地。所以,当普列汉诺夫、

列宁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决心抛弃这种做法,选择了通过公开的政治斗争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道路。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列宁的功劳,首先在于创建了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其主要成分仍然是急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又不可能完全摆脱或抹去与生俱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特质依然深刻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包括他们对西方社会思潮乃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不可避免带着这种矛盾的双重的态度来接受和解读。

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深入了解俄罗斯的国情而不盲目地照搬西方和教条地信奉经典,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并在新政权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航程;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越来越强化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充满悖论的特质,越来越把由特殊性带来的胜利视为绝对的普遍的真理,逐渐偏离了他们革命的初衷和目的,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或建设时期,对党内集中制的强调、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以往一切文化的区别等等都达到了绝对化的地步。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出现召回派和取消派,出现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重大分歧,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而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尤其当一党执政体制确立之后,党内出现如此激烈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残酷程度,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特征有极大关系。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条路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最初扮演的颠覆现存制度的角色,转换成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缔造者,而新制度里潜藏着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基因,又使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处于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导致话语权的丧失乃至思想火花

的陨灭。

尽管少数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特别是列宁晚年深刻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重新解读了根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感慨,着手探索一条符合俄国国情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国情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但列宁的早逝和传统势力的巨大惯性,使这种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并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共识。在党内,坚持列宁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力量”严重缺失,主导布尔什维克的仍然是俄国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传统精神。表面看来,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种已被斯大林主义严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似乎统治一切。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与其说来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不如说来之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憧憬。这是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宣布结束的根本原因。布尔什维克最后选择走向一条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自上而下的仰仗官僚化、军事化、集中化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径。可以说,这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向背的、很像被马克思痛斥过的那种“粗陋的”、“虚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是已经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再版;在这种模式下,“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这种模式,实际上把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把权力知识人自己,都交付给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交付给了一个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无所不能的领袖人物。对于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对苏俄实施的无情专政发出过警号,并说,如果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只有官僚成为社会唯一的活动因素,那么,即使有“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

同意提出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不幸的是,苏联最终出现的不是十几个领袖人物的集体专政,而是一个人的独裁。正是这种由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最终成为戕害自身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最终由社会主义的建构者变成丧失自己独立思想的附庸甚至受害者。

研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曲折多舛,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张扬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当然,研究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使本书的一些部分还显得较为单薄。值得一提的是,倪稼民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才思敏捷,学习勤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这本书,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能将深邃的思考和严密的论证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读后有所启迪。此外,文笔流畅,寓深思于浅近的文字表达之中,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2007 年初春于师大一村寓所

目 录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知识分子:现代社会变革的先锋和承载者		
	——	13
第一节 角色定位和作用	——	14
一、规范性定义的局限	——	14
二、从描述性角度来分类界定	——	17
三、走向社会政治前台的知识分子		
	——	2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试图建立话语霸权	——	24
一、从“哲学王”再到“利维坦”到“恐怖的美德”	——	24
二、革命话语霸权建立的物质性前提和		

	指导性意义	——	28
	三、话语霸权理论的提出及其自我限制	——	30
第三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	——	36
	一、极性悖论的群体及其激进的根源	——	36
	二、追踪激进主义的脚步	——	45
	三、从知识精英到政党精英	——	56
第二章			
转换:文明变迁中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			
		——	63
第一节	现代化路径变换与路径依赖	——	64
	一、路径转换的必然性	——	64
	二、路径依赖的惯性及其后果	——	71
	三、两类不同特征的革命知识分子	——	81
第二节	艰难的路径探索尝试和“文化力量”缺失的遗憾	——	91
	一、建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两种尝试	——	91
	二、先锋队“文化力量”缺失和列宁过早去世的遗憾	——	98
第三章			
建构的困扰: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	106
第一节	建构者面临的文化现实	——	106

一、俄国文化传统拖曳的阴影	—— 106
二、革命大实验后的社会氛围	—— 113
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及其被绝对化的影响	—— 123
第二节 建构新文化争论中凸显的理论倾向和思维方式	—— 130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的分歧	—— 130
二、工人反对派与马哈伊斯基主义	—— 137
三、经济建设争论中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倾向	—— 142
四、苏维埃理论家和苏共主要领导者的思维方式	—— 151
第三节 列宁的政治文化遗产和斯大林个人因素的作用	—— 158
一、列宁时期砌就的政治基座	—— 158
二、谙熟传统心理和善于施展手腕的总书记	—— 173
第四章	
话语失却：斯大林模式下的意识形态垄断	
	—— 182
第一节 斯大林话语霸权的确立	—— 183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转变”	——	183
二、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化	——	188
三、意识形态垄断的后果与实质	——	191
第二节 从先锋到独立话语的失却	——	199
一、理想与现实挤压下的权力知识人	——	199
二、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下的万马齐喑	——	209
三、话语失却的渊源分析	——	214
结 语	——	230
参考文献	——	252
后 记	——	265

绪 论

对以往历史采取割断、片面和否定等态度,就是对当下时代合法性的否定。任何一部历史都不可能是在没有任何渊源的虚无中产生,也不可能是在单一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任何一种真理都只在它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如果超越范围或夸大作用就走向反面,成为谬误。对于世界上第一个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走向现代化、完成工业化壮举的斯大林模式,我们是绝对不能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或不疼不痒地毁誉参半的。苏联曾经把这个模式当做斯大林的伟大成就,奉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和缺陷都是“破坏分子”、“人民的敌人”所为,这完全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历史结果的多方面的综合作用,神化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赫鲁晓夫又从反面神化了斯大林,把这个模式下的所有弊端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所为,以为否定了斯大林,保持对理想的信仰,恢复理论的“纯洁性”和本真状态,就可以在一瞬间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实际上恰恰是为了掩盖社会主义建设中失利的理论和实践原因,推卸自己(主要就是党内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责任,否认了在落后的、

资本主义严重不发达的俄国在第一个走向社会主义进程中必然存在的“历史根性”；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更多有全盘否定甚至把社会主义也一并“倒了出去”，这些观点和做法实际上不是把斯大林等同于斯大林模式，就是把斯大林模式混同于社会主义。这些态度使人们只关注领袖个人本身，而很少或根本不去对革命本身、对它的内在客观矛盾、对革命的历史条件、对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些态度更使人们仅聚焦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擅长于块状分析，而疏于把每个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对历史、对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是囿于这些既缺乏客观辩证的自省精神又没有历史感、责任感的评价，那既不能给未来带来光明，也不能让当下的人对以往历史作出深刻的反思和负起自己的责任，更不能免于历史黑洞把人类再次引向灾难。

我们应该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重建历史连续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不是要替历史或在历史进程中有重大作用的某种理论辩护，掩盖它的丑陋和缺陷，也不是要刻意建立某种陈列室、博物馆等来提醒人们牢记痛苦和愤怒的以往，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而是反思这种丑陋和缺陷为什么如此难以铲除和纠正？文化传统、历史观念和现实环境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领袖个人、人民群众又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否则反思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就没有了，重建历史记忆的目的和意义也就随之消逝。反思历史、重建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苦难、牢记仇恨，而是为了超越历史。今天我们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改的就是曾经从苏联那里照搬照抄过来的“斯大林模式”。由此，我们更需要对斯大林模式作出准确、全面、客观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特别是对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深层次的探究，以避免重蹈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之覆辙。

我们需要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俄国（苏联）历史大背景中去解读，

甚至需要放到当时世界历史进程大环境中去探索。我们不仅要弄清斯大林模式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更要弄清这个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对前一个问题已经有较多的但并不存在根本性异议的回答,如超级集中或超级集权体制;行政命令体制;战时兵营式保守主义体制;国家社会主义;专横官僚体制;极权主义或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高度集中、军事性和封闭性的体制等等。就是说,这是一个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的体制。对后一个问题即模式形成原因的种种分析研究,其实也是汗牛充栋、硕果累累。就国外来说,西方主要学者有罗·塔克、迈克尔·雷曼、让·艾伦斯坦、塞缪尔·法勃、摩西·来文、理查德·派普斯等等,俄罗斯东欧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米·马尔科维奇、莱·柯拉科夫斯基、亚·齐普科、罗·麦德维杰夫、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尼·马斯诺夫、阿·帕·布坚科等等,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多方面领域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探索。如法国学者艾伦斯坦指出,“斯大林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十月革命后的国内国际背景及俄国的国情有关。^① 亚·齐普科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者应为前者负责。柯拉科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罗·麦德维杰夫则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篡改和歪曲。^②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塔克认为,列宁主义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斯大林主义不是直接来源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他把斯大林主义看做由这样四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第一,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权体制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二,俄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和俄国的历史经验;第三,当时的历史

① 参见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

② 参见《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9页。

环境即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第四，斯大林本人的政治个性。^①俄罗斯学者沃尔科戈诺夫认为，马克思、列宁学说本身并没有错，“意识形态概念以及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学说的体系都不应对后来它们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被说明、解释和变为政治纲领这一点负直接责任。否则马克思就要在历史的审判前对波尔布特的罪行负责了，那岂不荒唐”。当然，他又认为，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分开来，“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必须承认，“斯大林主义是在列宁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但“这是一开始就被歪曲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条件下的一种畸形发展形势。”其根源“首先是许多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其次是俄国革命者的激进主义世界观”；“最后是发展的无选择性”^②。

就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当时苏联复杂而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和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观条件与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和其个人品行有关。也承认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系，只是这种关系是扭曲与被扭曲的关系，斯大林模式把人类文明的伟大的精神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教条和政治圣经。^③当然，每个学者在具体论述中各有不同的侧重和特色。有的特别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内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成分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学者把十月革命后国内复杂的社会危机和

① 李宗禹主编，马尔科维奇等著：《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

②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起源和演变》，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676页。

③ 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370页。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440页。卢之超、王正泉主编：《斯大林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61页。

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看做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而俄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以及斯大林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看做是模式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①……

应该说,不管他们站在何种立场上,采用何种方法,强调何种因素,其涉及领域之广,研究问题之深,都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历史提供了翔实的素材和多方面的视角。但笔者总感到还可以往下进行更深的探究。中外许多学者在分析模式形成原因中提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左”倾冒进思想、“俄国革命者的激进主义世界观”、十月革命后不久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和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执政”、官僚机器的日益庞大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泛滥以及从1923—1927年这段过程中党内派别林立、意见纷繁、争论激烈并始终围绕着权力斗争展开。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冒进思想”、“激进主义世界观”和“一党专政”以及官僚主义泛滥等现象呢?笔者竭力想了解并希望继续深入探究下去。当然,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俄国历史进程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回溯分析,才能引向所要探究的问题。

俄罗斯属于欧洲,但地处欧亚大陆之间的广袤平原位置的缘故,其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完全不同于欧洲。当然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结合起来有效地割裂了欧洲和俄罗斯。其一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野蛮光荣”,即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种崇尚政教合一、皇权主义至上和社会高度统一的文明。而在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件事使得与拜占庭帝国有联姻关系的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

^① 参见沈宗武:《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5页。

立”^①，一直以拜占庭的自然继承者自居。其二是蒙古人的入侵切断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而其东方的统治思想和管理模式则为后来的俄国建立东方式的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由此，20 世纪著名的欧亚学说奠基人 H. C.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其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分》中则明确指出，俄罗斯的国家体制本源于鞑靼的国家。^② 当摆脱蒙古统治的俄罗斯西望时，他们看到的是如此生机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又一次对自己的国家安全产生极大的忧虑。而通过国家集中统一来实现赶超、消弭危机是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集权制度的形成是俄国长期处于东西方的奴役和威胁的结果。^③ 为了安全，为了自卫，为了扩张（应该说最初这也是因其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安全感引起），他们首先急切需要从西方引进和学习的是军事技术知识和一切与国防直接有关的工业技术知识，而不是文明。所以，俄国现代化启动，一开始就属于（也只能是）沙皇政府主导的带有军事的、自上而下的特征。而专制的、农奴制的体制则注定了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是一条死胡同：它基本上没有也难以产生欧洲中世纪式的以商业、手工业为中心的自治城市，也就没有欧洲式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更谈不上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阶级意识的成熟自觉，整个社会动荡不定、分化严重，后来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更使得俄国在内外极度的压力下矛盾、冲突迭起，而沙皇政府已根本无法有效地维持正常的统治，处于岌岌可畏的边缘，革命一触即发。

1917 年二月俄国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推翻了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5 页。

②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Отуранском элемент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Антология. М., 1993. с. 72.

③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 页。